

·门外弹乐·

谁解肖邦真味

□梅明蕾

年前在浙江的乌镇大剧院有一场《世界的波兰——肖邦之心》专题音乐会。音乐会前的几天里,参演者钢琴家张昊辰、大提琴家史丞彦和主办方木心美术馆馆长陈丹青在微信群里语音畅聊肖邦。陈丹青将聊天内容发到网上,引来更多乐迷一片感发。

张昊辰认为,肖邦有一种才能是莫扎特所没有的,即他无论怎样用心去打磨作品,都不露打磨的痕迹。进一步体悟,会觉得肖邦是有洁癖的,可能是性格和气质上的洁癖,亦可理解为作曲技法上的洁癖,而呈现的结果,则是不露痕迹,这所谓“自然”。

张昊辰又感到,总难用一种“味道”来总结肖邦,但听得肖邦的音乐在某种忧郁和苦闷之间,忽然会有一种“骄傲”;或可说,总有那么一种冰洁而骄傲的东西,藏在一个沉郁、优美、抒情的外壳里。

坦白讲,凭着我对肖邦有限的了解(聆听、阅读),基本听不出这种精微乃至玄妙的感觉。我心目中的肖邦,旋律优美别致富有歌唱性,节奏处理灵活,和声转换独特,音乐个性鲜明,辨识度高,如此等等,不过是大多乐迷的共识,离张昊辰的感受,还差着档次。

应该承认,对音乐的体验和理解是有层次的。在针对古典音乐入门者有关“听不得懂”的困惑中,著名音乐教育家周海宏等专家学者直接给出赏乐不必求“懂”的悟,让众多“小白”对无标题音乐开始祛魅,这才理直气壮地跟着感觉走,率性作出“好听”与否的判断,热爱音乐的大门也就此打开。

诚然,无标题音乐乃是最抽象的艺术。



梅明蕾 媒体人,爱乐者,读写联杂。

同样的乐曲,不同的聆听者产生不同的感受和理解是完全正常的事。正如“贝五”开始的几个音符被人喻为命运的敲门声,既有贝多芬有关“命运”动机的提示,又有后世的音乐学家们对作曲家创作背景的探究,更有人在漫长的聆听过程中形成的共鸣,多方作用下,才坐实了“命运敲门声”这一象征的相对可接受性。但即便如此,也不能排除有人听出别样滋味,更不能断然认定听者有“错”。音乐之“空筐性”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赏乐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直感上的好不好听(这点非常重要),到听出轻重缓急、欣快沉重、欢乐悲伤等表层的情绪变化,再到庄严、自然、洁癖、骄傲等更复杂感受的深入体察,一定是有长期聆听经验的打底,乃至对音乐背景和乐理知识的不断积累和扩展。聆听如此,表演亦然,开始读谱,眼中只有音程关系和节奏变化,渐渐才将注意力移至乐谱上复杂的表情术语和指挥意图上。而指挥的理解也并非整齐划一,十个指挥心里有十个肖邦,视乎其个性气质、教育背景、审美偏好、水准高下等元素。

回到开头的“肖邦三人聊”,我佩服张昊辰们非凡的直觉和感悟力,更清楚那是作为顶级演奏家才可能抵达的高度或深度。但我不认为张昊辰对于肖邦的体察是唯一“正解”,在朗朗心里,怕又是另一番风景。这正是经典的魅力。我更不担心这样的各说各话会导向虚无,相反,这只会使经典时品时新,其内涵更加丰满。

《朋友,新年进步》用500多张明信片讲述新中国高校发展变迁史 “进步”是那年最时髦的祝福

□刘宇

武汉美术馆原副馆长刘宇特别擅长从收藏的大量视觉文献资料中梳理历史、启迪当下,2017年他和刘梦盈合著《大桥》,是首部系统全面开掘武汉长江大桥“视觉呈现”的记忆之书;2020年他和袁小山合著《时间开始了·武汉园艺志1949—1959》,见证了“共和国美学”的奠基时刻;前不久,他和潘妍合著的《朋友,新年进步》,则用500余张贺年片,折射出新中国高校的发展变迁史,也唤起了几代学人的青春记忆。



①《朋友,新年进步》刘宇 潘妍 编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②河北地质学院,“新年进步”。③上海中医学院,“祝您进步”。④南京航空学院,“向科学进军”。⑤湖南师范学院,1965年,“新年进步”。⑥浙江大学,1964年,“祝您进步”。⑦南京师专,1961年,“新年进步”。

·序跋集·

科学史并不仅是一个“里程碑”

□[英]萨拉·德里

历史是残酷的。如今约翰·丁铎尔默默无闻地安眠在公墓中,他的书一度鲜有人问津。经过了一个多世纪,最近十年间丁铎尔开始重新具有影响力。由于他在19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实验室中完成的关于水蒸气吸收热量的研究(今天我们称之为温室效应),丁铎尔被誉为“现代气候科学之父”。

而有点矛盾的是,这门学科本身是如此新颖。仅60多年前,气候还被认为是不会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当时气候学主要是一门地理科学,人们认为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气候,气候学家研究的是某些地区的气候与众不同的原因,而不是这些气候是如何变化的。他们用描述性和分类的方法,而非物理或数学的方法来研究气候。气候科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成为一门关注变化而非连续性的科学(并且通过改名与旧的“气候学”区别开),是几个不同学科融合的产物。《气候变化》(Climatic Change)杂志社成立于1977年,杂志的第一版投稿须知明确表示这是一门跨学科的科学,鼓励来自气象学、人类学、医学、农业科学、经济学和生态学领域的投稿。但实际上,这门新的跨学科科学是以地球物理学为中心的,包括海洋学、大气物理学、冰川学。此外,还有新兴的计算机科学为其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

之前对气候科学历史的讲述只强调成功而忽略失败,重要的发现就像一个“里程碑”似的在历史中依次出现,如同前往已知目的地的旅途中一定会遇到的指示路牌一样。

但这很容易误导我们。其实从各种意义上来说,丁铎尔并不是全球变暖理论的奠基人。他虽然帮助证实了水蒸气和二氧化碳具有吸收地球表面辐射热量的特殊能力,

但他从未考虑过人类可能会在区域甚至行星尺度上影响气候,比如他并未考虑人类燃烧煤炭时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此外,丁铎尔也并非第一个发表气候变化相关论文的人。早在他之前三年,美国的一位女科学家尤妮斯·富特就已经发表了相关研究。如果将气候科学的发展历史简化为一个“里程碑”,就会忽略其发展过程中更深层次的复杂性。有时,这种讲述会过分强调某个人物的影响力,而更多的时候,与当前科学观点不相符的人和更多的法则会被略去不提。因此,这样的历史表述会导致我们对过去乃至现在的理解变得单薄。

丁铎尔值得被大众重新记住并在科学史上留名,但他的影响力来源并不只是“发现”了温室效应这么简单。

他身体力行地开创了观察和认知大自然奥秘的新角度:连续性。对丁铎尔来说,没有什么物质比水更能展示这种连续性,他带着几近病态的狂热对水的各种表现进行了研究。他在自己的畅销书《水的形态》中,邀请读者与他一起追溯一条河流的源头,循着它的众多支流一路追溯到落雨的大气层。如丁铎尔所述,要产生这场雨,水蒸气必须通过热作用从海洋蒸发到大气中,这让他领悟到了地球上所有运动的最终来源。“在自然界中是否存在一个热源,能让海洋中的水蒸发到大气中形成云?”丁铎尔自问自答,“我们最终会发现它的源头是太阳。”

太阳的能量不断地改变着水的形态,而水又关系着地表的能量流动。丁铎尔坚持研究连续性,用他那维多利亚时代跨学科的研究思想成功揭示了水的本质。丁铎尔对水的研究所倾注的热情是他继续研究自然连续性的基石,而这激发了我创作本书的灵感。



陈洁 科普作家,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著有《山河判断笔尖头》《何河流的源头》等。

野口英世:了解比判断更重要

□陈洁

设想一下,你身边有一个人,4岁时掉进火炉,把左手烧残,结果造成心理上的扭曲和变态,你对他友好,他怀疑你别有用心,你明明没有歧视他,他却会敏感地敌视和攻击你,甚至动手打人。他家里又很穷,父亲是个酗酒、嗜赌的二流子,那些坏毛病都遗传给了他。他见到你就借钱,却从来还不,拿了钱就去买醉、赌博、买春。为了钱,他有时候利用自己的身世和残疾,卖惨装可怜,有时候吹嘘自己多么有天赋才华和伟大前途。为了钱,他可以轻易跟朋友亲人翻脸。他极度自卑又极度自负,内心阴暗、偏执、阴险。他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依赖别人的帮助却不知感恩,好像全世界都欠着他的。有一天,他心血来潮决定只身出国“求学”,没有人学通知,没有推荐信,什么都没有,八字都没一撇,他就逼着一直在帮助他人去借高利贷,给他筹学费。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人怎么样?恐怕所有人都避之唯恐不及吧。再想象一下另一个人,从小身残志坚,自强不息,学习优秀,外语基础也好。他坚韧、倔强、执着,立志学医,留学海外。他研究蛇毒,培养梅毒螺旋菌获得成功,先后找到小儿麻痹症和狂犬病的特定病原体,三次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为了能找到当时最可怕的黄热病病原体,他离开条件优越的美国,远赴厄瓜多尔,在那里发现了一种微生物钩端旋体属。为此,厄瓜多尔政府授予他陆军军医长、名誉大校称号,并设宴感谢。

当有人对他的研究提出质疑,他没有气急败坏,而是为了探究真理,转战非洲的加纳,再次寻找病原体,结果在加纳感染黄热

病,52岁便客死他乡。

这个人又怎么样?当然,他是为真理献身的科学家,一个大写的人。

前面那个人叫野口清作,后来他给自己改名野口英世,就摇身一变成了后面那个人。自从1900年前往宾夕法尼亚大学开展蛇毒研究,野口英世只在1915年回国一次,那次载誉归来在社会上轰动一时,毕竟在日本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中,他是早期留学并学成归国的先行者之一。

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家族熟人圈和学界的反应。

他之前给家人、朋友、同事带来太多痛苦的回忆,所以,亲朋好友没有欢迎他。而在日本医学界,始终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邀请他做报告、演讲或参加会议。在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医学教材中根本没有他的名字。这些遭遇深深刺激和伤害了他,从那以后,他与家人、祖国的医学界彻底反目,毕生不再回国。

所有这些历史,要到所有人都会离世的百年后,才消散在漫长长河中。2004年日本发行新版纸币,1000日元纸币上的头像不再是夏目漱石,而换成了野口英世。渡边淳一历时八年为他写成了传记《遥远的落日》,还有日本漫画以他为原型创作励志故事。

人的复杂性真是匪夷所思。世上本没有纯粹的“好人”或单纯的“坏人”。一个“好人”,未必是你能够容忍并与其相处的;请问,野口是好人还是坏人?所以啊,不要轻易评价一个人,不要简单判断一个人。了解比判断更重要。

从5000余件收藏中,精选500余张贺年片

贺年片作为一种表达新年祝福、传递友情的信物,相传在中国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始于唐,兴于宋,流行于明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建立起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贺年片从内容、材质到工艺都有所创新。

大学贺年片(主要是照片版)主要流行于两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热烈而优雅;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自由而潇洒。之后随着电子媒介兴起,大学贺年片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

我最初的想法是编辑一本大学贺年片集锦,除了贺年片,还收集学校画刊、招生简章、毕业纪念册、奖状、文艺演出邀请函等资料5000余件,让我对大学办学体制、文化传承有较为完整的了解。通过对每份材料的细致挖掘,身临其境地体会当年大学师生的理想抱负、关心激励、惜别感伤,将这些真实的情感带入书中。

本书从这5000余件收藏中,精选500余张贺年片,在内容上,这些贺年片有着反映时代特点的共性,如画面中描绘的卫星上天、巨轮下海、钢花飞溅、五谷丰登……这些贺年片也同样体现了不同院校的专业特性与个性表达,例如,地质院校的勘探现场,航空院校的飞机展示,邮电院校的电波发射,文艺院校的演出剧照等,既体现了各类院校的学科建设成果,也构成了独有的视觉符号。

在表现形式上,这些贺年片多以校园建筑和景观照片为主,辅以手绘图案、纹饰、书法拼贴等装饰性图案,体现了特定年代的文化品位和审美价值。

在结构上,本书大体分为工学、农学、新中国的新大学和其他大学四个部分。“工学”和“农学”部分体现了院系调整背景下,中国高校的20个重点学科建设历程,侧面反映了时代发展特点;“新中国的新大学”简要梳理了1949年后15所中国大学的建设和变迁,并通过百余张贺年片体现了当时的校容校貌;“其他大学”则讲述了工学和农学之外的专业大学和特色大学建设。部分文章设有“再见母校”小节,作为延伸部分,收录了与文章主题相关的形形色色的大学贺年片。

除此之外,本书还选用了表现运动会、文艺演出、读书会、毕业纪念等校园生活的纪念性卡片,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贺年片,但这些卡片也具有贺年片的功能(图片背后的新年寄语和落款时间可以佐证)。这些材料也能让我们对当时大学校园生活和大学生的精神面貌有较为直观的感受。

中国大学历史复杂,非本书所能承载。我主要围绕全国院系调整这条主线,通过对这一时期贺年片的解读,把贺年片本身的信息、学校变迁的节点有机地连接起来,既尊重历史,又扩大了想象

快览>>>

科学出版社成立于1954年,是新中国科技出版的“国家队”,也是“科学家的出版社”,本期《快览》介绍6本“科学好书”。

《玉神——石家河玉文化特展》盘龙城遗址博物馆 编

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重要开端,自20世纪50年代首次开展调查发掘,距今已有70年的历史。《玉神:石家河玉文化特展》依托70年来长江、黄河流域各地考古发掘出土、具有石家河风格影响的玉器,配合相关玉文化阐释研究文章,从玉器视角呈现新石器时代脉络中的石家河元素。

《造飞机的那些事——中国飞机制造案例集》王建华 齐振超 著

本书就飞机制造领域内所涉及的专业,提炼出作者多年来工作经历中的一些经验,相关案例通俗易懂、有浅有深,为读者阐述了宝贵的处理复杂技术和其他问题的技巧和实用方法,记载了中国航空制造发展的一个个事实,本书目的是让中国的航空工业工程师在工作中借鉴经验,汲取教训,少走弯路,是一本值得阅读和珍藏的专业读物。

《斯文不坠 伏典重光:二十世纪初中国文献四大发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敦煌研究院 甘肃简牍博物馆 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编著

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内閣大库档案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文献的“四大发现”。本书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文献四大发现展”图录,此次展览是迄今为止展品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四大发现”主题古文展,也是图书馆、博物馆、研究院、档案馆之间打破资源壁垒的一次圆满联动。

的空间,增强了本书的叙事性和可读性。

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200多所大学发展到今天的3000多所高校,每一帧大学贺年片都承载了一代又一代教育工作者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诉说着一段段有关青春、友谊、成长的动人故事。

北京新开“学院路”,武汉有了地质大学

70年前,北京西北郊长满庄稼的田野上开辟了一条新路,取名“学院路”。

20世纪50年代初,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制订了实现工业现代化的目标。面对即将到来的经济与现代工业体系的建设高潮,旧有高等教育制度与极不适应。中央人民政府决定院系调整,构建新中国高校制度。

这次院系调整的重点是取消私立大学,除保留部分综合大学外,按专业重新组合成立各类专业院校。

北京高校首先响应。中央有关部门在北京西北部建设“学院区”,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相关院系及许多专业学校合并组建了八个专业理工科高校。学院路西侧由南到北依次为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林学院,东侧依次是北京医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和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并于1952年暑期陆续开始招生。

学院路建于1952年,1954年建成通车,这3年也正是中国高校院系调整轰轰烈烈进行的时期,暴风骤雨般影响了当时每一所大学,可以说,由此奠定了当今中国高校的基本格局。学院路上的八大院校,是新中国高校建设的缩影,也是中国高校院系调整过程中变迁、发展的个案与鲜活标本。

我们就以地质学院为例子吧!中国地质教育起步于19世纪末期,1895年在天津开办的中国第一所新式大学——北洋大学,开设了地质学相关课程。

1909年,京师大学堂创办了地质学门。1949年,全国开设地质学科的高等学校仅有10所,从事地质、矿业的技术人员仅有299名,这与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目标极不相符。1952年11月1日,北京地质学院借用北京大学工学院大礼堂举办首届开学典礼仪式。地质部部长、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激动地说道:“现在新中国办起了惊天动地的事业,航天学院是惊天,地质学院是动地,你们就是动地的勇士……你们是新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

北京地质学院由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清华大学地质学系、原北洋大学地质工程系、唐山铁道学院采矿系地质组和西北大学地质系组建而成。1957—1958年曾改名为北京地质勘探学院。

此外,还先后成立东北地质学院(先后更名为长春地质勘探学院、长春地质学院)、西安地质学校

(西安地质学院)、宣化地质学校(河北地质学院)、成都地质勘探学院(成都地质学院),这些学院为培养新中国地质专业人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70年10月,北京地质学院迁往湖北江陵县,更名为湖北地质学院;1975年,整体迁至武汉市,更名为武汉地质学院。

1987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武汉地质学院更名为中国地质大学,之后武汉、北京两地独立办学,成为中国地质领域人才培养的摇篮。

再回首1956年,北京地质学院迎来了首届毕业典礼,同学们在即将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之际,筹资在校园塑立了一尊地质工作者雕像。高高的台基上,一位体魄雄健的男青年左手执矿石,右手紧握地质锤,腰系罗盘,身背双肩登山包,充满了力量感。

我们在地质学院的贺年片上,也能看到地质勘探队员身背行囊,拄着登山杖,踏雪攀登山峰的场景。如果说这类图像是地质员真实生活的反映,那么地质学院的雕塑则是广大地质工作者形象的艺术再现。此后,这尊雕像多次出现在多个地质学院的贺年片上,构成了地质学院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谱系。

我为什么用“进步”给这本书取名?

这些贺年片里蕴含的信息量不小,除了校史校名、校园建筑、流行图案之外,祝福语的内容也很有意味。除了常见的“新年好”“恭贺新禧”“新年快乐”之外,还有颇具时代气息的特色语言。

东北林学院1958年贺年片上祝福语是:“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替河山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新中国的林业也是新中国的艺人。”既有豪情壮志,又不失文雅。

南京航空学院的祝福语铿锵有力——“向科学进军”,画面则是地球仪、轨道空间站、卫星和火箭,动感强烈,把风云浓缩到方寸之间。

武汉化工学院的祝福语是“书到用时方很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图案是一位站在书架前的女郎。该校1980年3月更名为武汉化工学院,这张乙丑年贺年片从图案到话语都有一股浓浓的80年代味道。

而最打动我的,也是5000张藏品中最有共性的祝福语,则是“进步”。从河北地质学院和南京大学的“新年进步”,到浙江大学和上海中医学院的“祝您进步”,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的“祝君进步”,以及吉林医科大学的“祝您新年进步”,“进步”二字可以说贯穿了整个五六十年代,是当时最时髦的祝福。

这些当年的大学生,为什么热爱“进步”?我想,“进步”就是他们的热情和理想所在,是他们追求一生的目标,也是他们对自己的期许,对社会进步、国家进步的渴盼。到今天,他们至少是年过七旬了,我想,他们已经看到了“进步”。

于是,我把这本书取名为《朋友,新年进步》。

《中国文化遗产知识2500题(修订版)》一言 编著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和文化遗产大国,遗存分布广泛,种类丰富,数量众多,价值珍贵。本书是《中国文化遗产知识2500题》一书的修订版,收录、更新2019年12月31日以来的文化遗产发掘、保护、利用新知,并对第一版的题目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考证与整理。

《啊哈!灵机一动》[美]马汀·伽德纳 著

本书是科普经典,作者是著名的趣味数学家。该书横跨现代科学的一些重要分支,诸如拓扑学、运筹学、数论、图论、集合论、概率论……乃至人工智能,同时结合介绍某些已告解决或悬而未决的世界难题。本书涉及六十五种类型的问题,将奇妙的问题寓于妙趣横生的故事当中,一旦领悟,解答出人意料,由不得“啊哈,灵机一动”!

《从一到无穷大》[美]乔治·伽莫夫 著

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科普经典名著之一,20世纪70年代末引进出版后,曾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直接影响了众多的科普工作者。本书根据原书最新版进行了修订,介绍了20世纪以来科学中的一些重大进展,阐述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四维时空结构,并讨论了人类在认识微观世界(如基本粒子、基因)和宏观世界(如太阳系、星系等)方面的成就。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整理)

